

学会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

——重温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 赵 慧

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1941年至1944年期间，为了彻底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进一步提高党的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中央政治局多次组织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展开讨论。这场讨论历时4年之久，覆盖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为1945年党的七大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学习和时局》是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关于党的历史讨论时所作的讲演。今天，我们重温这篇重要著作，学习领悟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坚持用辩证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科学认识党内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延续了《矛盾论》的基本认识，“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矛盾的普遍性意味着矛盾不仅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还存在于人们的思维领域。我们党就是在矛盾运动中产生、发展和前进的，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削弱。在实践中，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认识党内矛盾和斗争问题，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前提。不承认这种矛盾或者回避这种矛盾，都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

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毛泽东认为，虽然这些斗争是合理的，但是在斗争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其一，没有使干部彻底弄清思想；其二，没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毛泽东指出：“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

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面对党内存在的矛盾与斗争，既要彻底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要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长期以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已经成为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途径，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对党的历史应采取分析态度。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期间，“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实行了长期的统治，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提出要用分析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在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干部策略的错误，又要看到这些同志在反对国民党、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等基本问题上是和大众是一致的。对于党的六大所确定的路线，也不能一味否定：一方面，它在主要方面和路线上是正确的，“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另一方面，它也是有缺点的，“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1945年4月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去评判历史，就是根据毛泽东“不要否定一切”的要求作出的。

对具体工作应采取分析态度。“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泽东主张对于任何问题都要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既不要绝对肯定也不要绝对否定。客观地、科学地分析问题，不是凭主观臆想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具体调查了解的基础之上。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理念。陈毅读完《学习和时局》后深刻剖析自己：“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更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

法。”当工作已经取得成绩、处于进步状态的时候，要善于发现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当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正在上升发展的时候，要能够发现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以争取新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停滞不前的理由，否则，争取新的胜利将成为不可能。

学会“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1944年正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为了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提倡党的干部要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学会“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放下包袱”，即解除我们的精神负担。“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包袱和负担呢？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种种行为表现，比如，犯过错误的、工作无成绩的、斗争历史短的，都可以使人悲观丧气；相反，未犯过错误的、工作有成绩的、斗争历史长的，都可以使人趾高气扬。当时，一些同志对即将取得的胜利表现得过于乐观，甚至出现了骄傲自满的心态。毛泽东认为这种心态是极其错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因骄傲而导致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的教训，并警告全党“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号召人们放下自己背上的包袱，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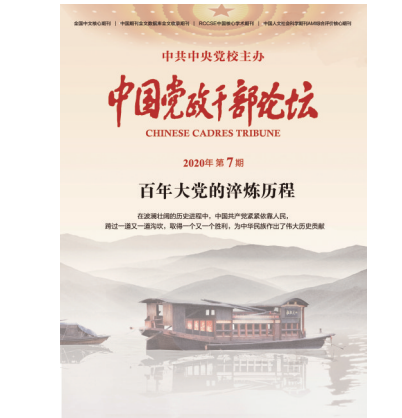
“开动机器”，即善于用脑筋思考问题。“心之官则思”，毛泽东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他把不善于思索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包袱的”，因为背上了包袱，所以不肯使用脑筋；另一种是“没有包袱的”，因为不愿意多想问题，结果也一事无成。毛泽东指出：“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就要求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实际相结合，还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善于思索、敢想敢干、多想苦想。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用先进技术和方法改造企业时就强调要学习毛泽东



开动机器的方法，他说，“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在毛泽东看来，解除精神负担和善于运用思想器官，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既能放下包袱，又懂得开动机器，那便“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放下包袱是前提，包袱没有放下就去开动机器，必然会束手束脚、僵化禁锢；若只是放下了包袱，却迟迟不能开动机器，必然会走向弯路、走向歧路。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2013年，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2015年，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上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事业愈是向纵深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愈是复杂多变，就愈加迫切需要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

重读经典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不断攻坚克难、化危为机，淬炼成为百年大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危局、开拓新局的伟大实践，对于我们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20年第7期特别策划“百年大党的淬炼历程”系列文章，选取党史上6个重大历史转折点邀请专家学者撰文阐释。

1927年是血雨腥风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难。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是什么力量支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顽强抗争，奋力前行，开拓新天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炳林在《中国共产党如何从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中孕育新机》一文中指出，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从危难中奋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建设一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奋起的强大

《中国共产党干部论坛》2020年第7期聚焦

百年大党的淬炼历程

□ 胡秀荣

支柱；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从危难中奋起的重要法宝；坚持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奋起并找到新路的基本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遵义会议前后党和红军经历了党的历史上最严重的危局困境，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正是由于成功化解了这一危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留住革命火种，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次危机有何特点，转危为安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一级教授、少将邵维正在《遵义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如何一步步化危为机》一文中指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持续时间更长，涉及面更广，而且是由多次险情构成的，而转危为安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次重大危机的克服历时两年，其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先后经历了多个相互联系的事件：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和序幕；遵义会议是解决危机的枢纽和标志；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伸和完成；扎西会议后红军实施一系列迂回机动，调动敌军，摆脱重兵围追

堵截；冲破强敌重围北上长征途中，党和红军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分裂危机，粉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内战爆发的重大危机。国共实力的差距、国际环境的变幻、两种前途和命运的抉择，是摆在其面前不可回避的难题。中国共产党如何在这次历史性抉择中化危为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长张神根等在《在历史性抉择中迎接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如何化危为机取得解放战争胜利》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及早对不利形势作出预判分析，充分做好应对危机的两手准备，为革命取得胜利争取到了主动权；中国共产党面对抗战胜利后纷繁复杂的局面，将战略定力、战略判断、战术决断相统一，谋全局、抓关键，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出一系列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为解决危机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敢于斗争、斗争到底的顽强意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持；人民是伟大事业的推动

者、践行者，始终保持坚定的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才拥有了革命的力量源泉，拥有了胜利的根本保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可称作新中国初期，也是毛泽东说的“进京赶考”的第一阶段。面对种种超乎想象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怎样交出了进京赶考的第一份答卷，对于我们今天迎接国际国内各种挑战有何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在《进京赶考的第一份答卷——新中国初期克难制胜的历史启示》一文中指出，首先，由于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民主建政、民生问题和从严治党，所以不仅经受住了全国执政和市场经济的考验，而且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巩固和加强，在各阶层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解决困难自然也就相对容易了。其次，为了巩固新中国独立，恢复国家主权完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一方面采取除非他们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否则就不给他们在华特权一一取消，不再允许外国

用典释义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虞诩，字升卿，东汉名臣。汉安帝永初年间，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叛匪宁季等数千人连年聚众作乱，攻杀县吏，地方州郡都无法平定。大将军邓骘便命虞诩做朝歌县长。虞诩的故交旧友都为他深感担忧，纷纷赶来劝慰道：“到朝歌上任多倒楣啊！”虞诩却坦然笑答：“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意思是说，立志不求容易，做事不避艰难，这是做臣子的职责。不遇到盘根错节难砍伐的树，怎么识别哪个器具是锋利的呢？
【讲话原文】 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让你们这届高校毕业生经受了磨练、收获了成长，也使你们切身体会到了“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道理。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矢志奋斗。同学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希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虞诩上任之后，便设立三个等级招募壮士：能够征战劫夺的为第一等，干过伤人偷窃行为的为第二等，服丧而不事家业的为第三等。共招募了100多人，虞诩设宴招待他们，宣布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过，派他们混入叛军队伍中，引诱他们前来劫掠，于是设伏斩杀了叛贼数百人。他还派会缝纫的贫苦百姓给叛军做佣工，在给他们缝制衣服时，悄悄在衣襟上缝上彩线作暗记。这样一来，叛贼一进入街市，差役们就可以根据暗记逮捕他们。叛军以为虞诩有神明相助，纷纷溃散，朝歌从此得到安宁。
——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2020年7月7日）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中引用了这句古语，肯定他们到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并寄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杨立新）
【出处】 邓骘兄弟以谢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诩。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诩曰：“得朝歌何衰！”诩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	——（东汉）范曄《后汉书·虞诩传》
【解读】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是对《后汉书·虞诩传》“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化用。意为立志不求容易的人必能成功，做事不避艰难的人能够进步。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7期目录	
【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 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黄守宏
【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经济共享发展评价指数研究 COVID-19背景下的总需求冲击、经济波动与我国政策应对 理性看待财政困境 慎用财政赤字货币化	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组 杨英杰 周春生 冯 科
【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笔谈】 破立并举 四个坚持 创新科研评价体系 建立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四种关系 破除“SCI至上”与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 正确发挥同行评价的作用	荆林波 王文军 朱 剑 苏金燕
【“一国两制”研究】 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制：宪制基础与制度完善	焦洪昌 王 柳
【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语境下市场监管领域“黑名单”制度的优化 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	刘双舟 马婷婷 蓝煜昕 张 雪
【比较与研究】 德国机构编制管理及其借鉴意义	王 芳 谭景辉

展，冲破了“两个凡是”禁锢，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推动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4个重要成果和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致同意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又来到一个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面对党内存在的诸多困难挑战，怎么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沈传亮撰写《在应对大变局中开拓新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一文指出，在习近平总书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涉及党的领导、内政外交国防等方方面面，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实现重大进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生深刻变化；外部环境塑造成效显著；国防军队建设浴火重生。